

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

□逢锦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南开大学 经济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从2010年开始,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分析,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学方法。一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方法。一种是凯恩斯的总需求分析方法。按照马克思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原因,虽然结构性需求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在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不足,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畅,要素生产率较低等,这实际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的阶段性特征。所以,认识引领新常态,保持国民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要牢牢把握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创造新供给;要妥善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关系,保持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把深化改革和惠民生紧密结合。而对于需求和消费不足要客观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是结构性需求不足,不宜笼统地认为我国已经是“过剩经济”。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经济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6)02—0005—11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6.02.002

大致从2010年开始,由内生因素决定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还会持续。在新常态下,如何保持国民经济以合理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如何保证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实现转变,如何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传统的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创新驱动,学术界发表了很多见解,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拟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的原理,以便从中得到一些对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促进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新常态及其分析的两两种经济学方法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以年均9.8%的速度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从2010年开始经济速度连续几年下降,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已成定局。以此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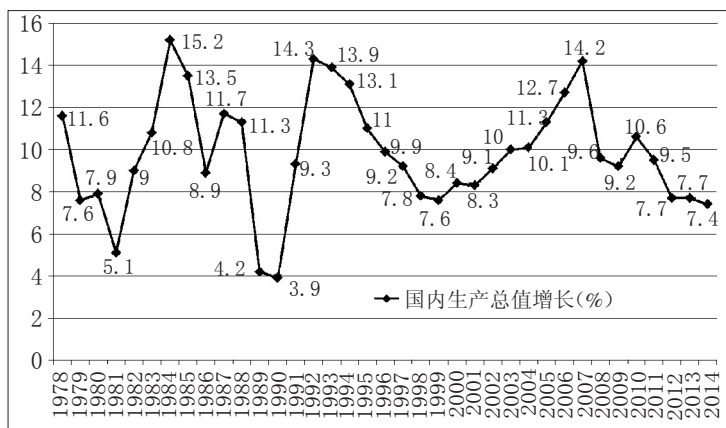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8—2014年)

数据来源:1978—201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国家数据,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a=q&type=global&db-code=hgnd&m=hgnd&dimension=zb&code=A020A01®ion=000000&time=2013>, 2013年, 2014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不断污染,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发展方式总体上表现为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不独我国在使用,国外也有使用,但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国外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几十年中,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较稳定的持续繁荣增长的长周期而言的,用以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趋势:即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共财政面临挑战,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由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①这一表述先在国际金融界引起反响,后为宏观经济领域引用。

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分析,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学方法。一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方法。一种是发端于凯恩斯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惯用的总需求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主观臆想的,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的结构性。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实质和核心,“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2]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中应用产生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就具体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这种方法和原理在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得到了集中地体现和反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关系表现为:^[3]

第一,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生产。生产性消费与生产是同一的,在个人生活消费上生产决定消费,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的动力。消费则反作用生产,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活动结果的劳动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

^①2009年初,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埃尔埃利安在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时用了“新常态”一词,这一表述先和金融界引起反响,后为宏观经济领域引用。

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作用和反作用生产。作为生产前提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决定生产。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生产决定分配;在分配方式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决定了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促进或延缓生产的发展。

第三,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媒介生产和消费。生产决定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用于交换的产品需求就会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也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鉴于上述,马克思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3]

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分析方法,为我们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原理,对于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同样是适用的。

对经济新常态的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发端于凯恩斯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惯用的总需求分析方法。凯恩斯是凯恩斯主义的创始者,1936年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曾被西方学者视为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他本人则被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凯恩斯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矛盾也不断加深和尖锐化。在这不长的年代里,曾爆发了1890、1900、1907、1913、1920、1929—1933、1937年7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基本的表现是需求不足,并由此导致企业倒闭,大量失业。这样的背景使凯恩斯的研究盯住总需求,并把需求分析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是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

建立在三个规律之上,凯恩斯认为,仅靠自由市场机制是无法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的,必须加强国家干预。据此他提出,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应当由政府采取措施来刺激需求,而总需求随着投资的增加,可使收入增加,消费也将增加,经济就可以稳定地增长,以至充分就业,使生产(供给)增加。凯恩斯这一论点被他的追随者们奉为定律,称为凯恩斯定律。^[4]

凯恩斯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并由此重视需求的总量分析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只抓住了现象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把需求不足的原因不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为三条基本心理规律,则是严重的不足。

凯恩斯理论产生之后,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都极力推行凯恩斯政策,初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景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越来越无能为力。但尽管如此,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凯恩斯定律一直以来都是主流的经济定律。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与凯恩斯的分析方法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但二者的根本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危机的原因,认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凯恩斯则无视或者有意回避了这种基本矛盾和根本原因。

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按道理说应该更好地重视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宏观政策,但遗憾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对此我们做得不够好,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地借鉴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结果眼睛盯住消费需求而对生产重视不够。直到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5]事情才有了改观。凯恩斯的方法无疑可以借鉴,但完全依赖于凯恩斯的需求分析,过分地寄希望于斯,既不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和把握,也不利于对经济新常态的引领和驾驭。

二、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究竟是什么重要因素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按照凯恩斯的分析方法,似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一样,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但是,究竟我们的经济是否真的需求不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经济需求不足,则靠凯恩斯主义就很难给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答案。

对此,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原理则可以给我们重要的指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无疑有外部因素的诱导,但根本原因在我国经济内部。

就外部因素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和其后的严重影响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以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几乎逐年提高(见表1),说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我国经济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获得益处;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外需的拉动。在这样的条件下,2008年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打击很大,我国也未能幸免,最直接的影响是,外贸出口锐减,国内以出口为主的大量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有的破产,由此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

表1 2008年以前我国外贸依存度(1978—2008年)

| 年份 | 指标 对外贸易依存度(%) | 出口依存度(%) | 进口依存度(%) | 年份 | 指标 对外贸易依存度(%) | 出口依存度(%) | 进口依存度(%) |
|------|------------------|----------|----------|------|------------------|----------|----------|
| 1978 | 9.85 | 4.65 | 5.20 | 1994 | 41.90 | 21.42 | 20.48 |
| 1979 | 11.24 | 5.23 | 6.00 | 1995 | 38.32 | 20.30 | 18.01 |
| 1980 | 12.56 | 5.97 | 6.58 | 1996 | 33.58 | 17.50 | 16.08 |
| 1981 | 14.95 | 7.47 | 7.47 | 1997 | 33.82 | 19.01 | 14.81 |
| 1982 | 14.32 | 7.68 | 6.64 | 1998 | 31.52 | 17.87 | 13.65 |
| 1983 | 14.26 | 7.26 | 6.99 | 1999 | 33.05 | 17.87 | 15.19 |
| 1984 | 16.47 | 7.96 | 8.51 | 2000 | 39.24 | 20.62 | 18.62 |
| 1985 | 22.66 | 8.87 | 13.79 | 2001 | 38.12 | 19.90 | 18.22 |
| 1986 | 24.80 | 10.40 | 14.40 | 2002 | 42.26 | 22.17 | 20.09 |
| 1987 | 25.24 | 12.03 | 13.21 | 2003 | 51.28 | 26.40 | 24.88 |
| 1988 | 25.06 | 11.58 | 13.47 | 2004 | 59.11 | 30.38 | 28.73 |
| 1989 | 24.06 | 11.33 | 12.74 | 2005 | 62.27 | 33.36 | 28.90 |
| 1990 | 29.31 | 15.74 | 13.57 | 2006 | 64.25 | 35.36 | 28.88 |
| 1991 | 32.82 | 17.38 | 15.44 | 2007 | 61.92 | 34.72 | 27.20 |
| 1992 | 33.52 | 17.19 | 16.33 | 2008 | 56.73 | 31.65 | 25.07 |
| 1993 | 31.53 | 14.78 | 16.74 | | | | |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国家数据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对2013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及历史数据修订的说明计算得到,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6/t20150603_1114905.html;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从 2008 年算起至今已经 8 个年头,但西方国家复苏缓慢,滞后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各国正抓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变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这样的国际因素显然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外因,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

但外因只是条件而内因才是根据。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国民经济内生的原因。由于社会生产是一个整体,它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所以,分析导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内因,应该循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相互作用的思路展开。

首先是生产环节。生产环节的因素主要包括创新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不高。应该肯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产效率都有显著地改善和提高,正是由于这些改善和提高,所以才有了我国经济总量从 2010 年开始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成就。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的的事实是,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就发展方式而言,资源耗费高而增长效益较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2009 年,我国 GDP 占世界的 8.6%,却消耗了世界 46.9%的煤炭和 10.4%的石油。同年美国 GDP 占世界的 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 15.2%和 21.7%;日本 GDP 占 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 3.3%和 5.1%。与此同时,较多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日渐突出。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海洋污染、陆地污染严重。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产业结构而言,不够合理的状况是长期存在的。我国产业结构是以工业为支撑的“二三一”的模式,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10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43.0%,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已分别超过 50%和 70%。

就劳动生产率而言,2008 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 GDP 为 10378 美元,仅为世界水平的 60%,美国的 15.8%,日本的 22.8%;投资效率总体低下,资金高投入、低效益、低水平运作的问题突出;

就经济发展动力而言,我国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主要是靠传统要素投入的拉动,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这与我们对科技教育投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2010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R&D)占 GDP 的比重为 1.7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2%以上的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足 3%,低于 4.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 5%。^[6]

其次是分配环节。分配环节的问题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劳动产品的分配。生产要素的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劳动力的分配。

作为生产前提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决定生产。我国生产要素的分配总体上是适合我国发展要求的,但是在发展中,也有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1 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中提供的资料,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淘汰落后产能压力增大。近年来重化工业中重复投资所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影响我国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在许多产能过剩行业中还伴随着相当数量的落后产能,在炼钢、炼铁、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行业中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十二五”时期仍需淘汰 7000 万吨炼铁、2.5 亿吨以上水泥、600 万吨铁合金、4000 万吨

焦炭的落后生产能力,2011年涉及淘汰落后产能的18个工业行业中有10个行业目标任务比去年有较大增加,在人员安置、债务处置、兼顾地方利益等方面面临更大难度和压力。^①

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虽然总体上说人民群众在分配中得到实惠,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存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衡量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②连续多年在0.4以上,2008年最高时达到0.491。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0.4以上就表明该国的收入分配还存在很大改进余地。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3.03:1;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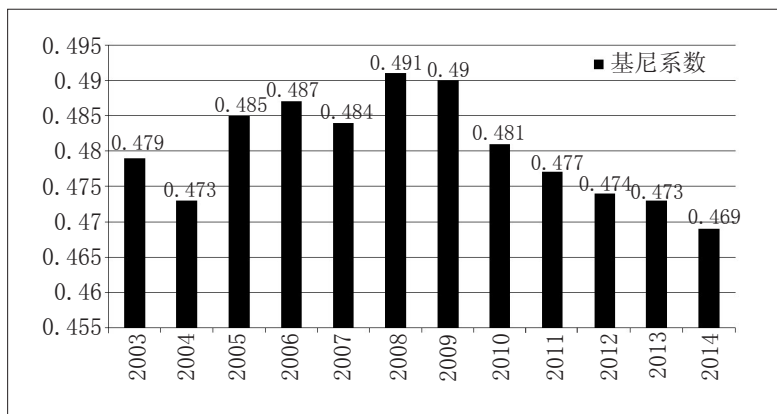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2003—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2003—2012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1/t20130118_17719.html,201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发展稳中向好”,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20_502082.html,2014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4公报解读: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03/t20150311_692389.html。

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也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上述问题的存在,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下去必然对生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是消费环节。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个人生活消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这两类消费都比较快,但也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二者相比,生产性消费即投资占的比重一直较大,生活性消费占的比重一直较小。以2009年为例,我国投资率为47.7%,消费率为48.0%,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金砖国家”中其余国家(高者巴西为83.6%,低者印度也有69.6%)。

二是投资方向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持续存在,以致使供给发生结构性不足和过剩并存。

三是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存在。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与我国所处的阶段不相适应,而低收入群体的一般性消费受收入限制则明显不足。

以上是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分别进行分析,就其相互联系的角度分析,导致我国经济

再次是交换环节。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的交换活动日趋活跃。但是,市场不够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的问题大量存在,以致交换没有很好地发挥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一是要素市场不发达不健全,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并存。二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三是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依旧存在。

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

^①资料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1年9月13日,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②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它是一个比值,数值在0和1之间。基尼指数的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一般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则因为收入差距过大。

表2 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投资与消费所占比重(%) (1978—2014年)

| 年份 | 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 | 年份 | 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 |
|------|-----------------|-----------------|------|-----------------|-----------------|
| 1978 | 62.1 | 38.2 | 1997 | 59.6 | 35.9 |
| 1979 | 63.9 | 36.6 | 1998 | 60.5 | 35.3 |
| 1980 | 65.5 | 34.8 | 1999 | 62.7 | 34.5 |
| 1981 | 66.7 | 32.9 | 2000 | 63.7 | 33.9 |
| 1982 | 66.5 | 31.8 | 2001 | 62 | 35.9 |
| 1983 | 67.4 | 31.7 | 2002 | 61 | 36.4 |
| 1984 | 65.8 | 34.2 | 2003 | 57.9 | 39.9 |
| 1985 | 65 | 39 | 2004 | 55.2 | 42.2 |
| 1986 | 64.8 | 37.7 | 2005 | 54.1 | 40.5 |
| 1987 | 62.6 | 37.3 | 2006 | 52.4 | 40 |
| 1988 | 61.8 | 39.1 | 2007 | 50.6 | 40.7 |
| 1989 | 63.9 | 37.1 | 2008 | 49.7 | 42.6 |
| 1990 | 63.3 | 34 | 2009 | 50 | 45.7 |
| 1991 | 61.9 | 35.3 | 2010 | 49.1 | 47.2 |
| 1992 | 59.7 | 39.3 | 2011 | 50.2 | 47.3 |
| 1993 | 58.3 | 43.6 | 2012 | 50.8 | 46.5 |
| 1994 | 58.2 | 40.5 | 2013 | 51 | 46.5 |
| 1995 | 59.1 | 39.3 | 2014 | 51.2 | 46.1 |
| 1996 | 60 | 38 | |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对2013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及历史数据修订的说明,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6/t20150603-1114905.html>

生产创造出消费的物质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创造出消费的动力,但消费则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活动结果的劳动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至于交换,它可以使产品实现、市场扩大、需求增加,从而使生产发展。马克思曾把在交换中商品能不能卖出去比作“惊险的跳跃”^[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的这种重要性也无二致。但是,需要明确,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经济新常态的这些影响和作用,是通过对生产的反作用而发生的,所以,不宜离开生产而片面地谈需求不足是导致新常态的原因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既是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经济新常态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分析了之后,还应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实现形式。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源除了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有关

进入新常态的内在原因可概括为:

第一,生产性因素是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性因素。生产领域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生产效率不高和科技对生产的贡献不大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原有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所以在高速增长了几十年后,渐入经济新常态是合乎规律的变动。

第二,分配领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是生产的前提,实际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消费领域生产性消费作为生产要素的耗费,与生产是同一的。所以,对于分配领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和消费领域生产性消费,对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决定性作用,应该与生产性因素同等看待。

第三,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个人生活的消费和交换对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作用,要给予客观地估计和足够地重视。作为劳动产品的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在个人生活消费上,虽然

外,重要根源是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一系列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而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要引领、驾驭经济新常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新常态,新问题,要保证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以上的分析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就是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用以指导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要把改革发展总体思路和长期政策措施的着力点从注重需求转向在注重需求的同时注重生产。我国曾不止一次地做出判断,十八大又进一步声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8]在理论上大家对这个判断似乎没有争议,但在具体判断和政策措施上,往往把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误以为我国经济似乎已经是过剩经济,社会主要矛盾似乎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的矛盾。究竟是我们对社会所处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准确还是实际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干扰,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里有一个区分经济现象和本质、短期和长期的方法论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和本质并不完全一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运行短期出现的问题也不一定和长期的根本问题相一致,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看问题可以发现,虽然我国经济在某一阶段受某些因素影响,某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但那时短时的、局部行业的问题,而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是“过剩”经济,出现局部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我国的基本矛盾使然,而是短期的政策性和市场扭曲的结果。同样,虽然我国经济在某些时段出现生活消费不足,但那是由于短期分配政策的原因,是结构性的消费不足,是社会保障等措施没有跟上等原因所致,也不意味我国是需求不足的经济。

基于以上认识,把改革发展总体思路和长期政策措施的着力点从注重需求转向注重需求的同时注重生产,应该是经济新常态下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和措施。对此主要应抓好:

第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中心地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9]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提升,也是指导“十三五”乃至整个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发挥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和深入推进“五大发展”。

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就必须把生产摆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决定地位,把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摆在中心地位,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解决一切前进中的问题就失去了根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适合新阶段新特征的中高速增长,要有高质量高效益的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稳定增长。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要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例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增长,生态和民生改善引起的增长等等,都是一些新的增长点。由于生产性投资本身就是生产,所以新的生产性投资点就是新的增长点。

第二,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更加重要位置,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步伐。

强调把生产摆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决定地位,要求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过去靠消耗大量资源和大量劳动投入实现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不能为继,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同时,更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环节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要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上升。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优化产业结构。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主要矛盾,随着经济发展,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供给中结构性矛盾突出,所以要通过市场的作用和企业兼并重组等形式,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压缩产能过剩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把创新驱动摆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强调把生产摆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决定地位,要求从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积极性激发出来,调动起来。要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要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第四,狠抓改革攻坚,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提供制度保证。

强调把生产摆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决定地位,要求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不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靠全面深化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深化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政府要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为创新拓宽道路。要靠改革放宽政策,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致力于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推动在今年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制定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在重点阐述围绕生产在社会生产四环节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必须采取的措施之后,需要指出,强调生产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或忽视分配交换消费的作用,也不是要完全否定或忽视凯恩斯的需求分析,而是要说明,不要因为重视消费的作用而忽视生产,或者颠倒它们的关系。

对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要给予重视。

措施之一是,在改革中要深化分配领域改革,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消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讲求公平和效率;对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在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对于因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所引起的收入增加,要采取税收等杠杆加以调节;重启去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缩小过大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以利于发挥分配对于生产的反作用,有利于通过分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措施之二是,要深化交换领域的改革,包括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等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措施之三是,深化消费领域改革。生产性消费就是投资,对于投资前面已有论述,关键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投资比例、投资效益。经济进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了,投资永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而是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地方去,大力提高投资效益。我国的投资一直是比较旺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比较关注的是消费需求,基本的逻辑是,我国出现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可以列举出好多数据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的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但向深处分析,问题并不像现象那么简单。表面上是消费问题,根子却在分配哪里,分配到的根子在于,财富集中到一些一部分人哪里,而那些人的收入很高但消费是有限的,按西方经济理论说是那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甚低,而另一大部分人例如大部分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不高想消费而没得消费。这是分配的结构问题引起的消费不足。解决这样的消费不足单靠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必须解决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这是个难题,讲了很多年但收效并不显著。今后还需要持久战。所以消费问题实际上是个分配问题,而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要素的所有关系决定的,所以消费的问题最终根子在生产条件即所有制关系。当然消费问题有如何形成新的消费热点的问题,但那又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问题。^①

^①参见拙作:《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2015年7月1日《光明日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4-11-09.
- [2]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1.
- [3]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6.
-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M]. 魏埏,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5]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N]. 人民日报, 2015-11-25.
- [6] 马建堂. 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N]. 人民日报, 2011-03-17.
- [7]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资本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 年 11 月 8 日) [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 [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收稿日期: 2015—12—15 责任编辑: 谭晓梅)

**Fundamental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rxist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and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for new economic normality**

Pang Jin-jv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Since 2010,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pped into a new norm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from fast growth into medium growth. Two major economic methods can b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China's new economic normality. One is Marxist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which is a method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other is Keynes's gross demand analysis method. According to Marxist fundament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new normalit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insufficient structural demand is one of the reasons, it is not the major reason. The main causes lie in production field, i.e., extensive production pattern,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nsmooth conver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practical productivity, and low element productivity, etc. That is practically the feature of specific phase i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of people's increas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backward social production. Therefore, to realize and guide new normality and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haring,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and persist in development;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djust economic structure, put emphasis on innovation driving, create new suppl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quality, efficiency and growth rate, maintain medium and fast rate in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to combine deepening reform with benefiting people closely. As to insufficient demand and consumption, we need to analyze objectively and take measures correspondingly. Insufficient demand in China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and it is improper to consider it as "surplus economy".

Key words: Marx;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New economic normality; Major social conflict; Develop productivity